

试析青铜时代贺兰山、北山岩画 与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

——兼论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

朱存世¹ 李 芳²

(1. 银川市文物管理处, 宁夏 银川 750004 2. 银川市文物管理处, 宁夏 银川 750004)

摘要 贺兰山和北山的鹿石鹿岩画与虎岩画,是青铜时代比较重要的文化遗存。仅分布于贺兰山、北山及腾格里沙漠南缘的‘鹿石鹿’岩画,是我国新疆阿尔泰及图瓦、蒙古国、外贝加尔等地流传的‘东方鹿石’鹿的再现。同样,仅分布于新疆天山山脉中部、嘉峪关黑山和腾格里沙漠南缘的虎岩画,是主要分布于宁夏北山、贺兰山及阴山虎岩画的再现。两种同时代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岩画线形分布地域的重叠性和互补性,反映出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反映出贺兰山、北山即今宁夏北部地区是青铜时代欧亚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

关键词 青铜时代 岩画 草原丝绸之路

中图分类号 K8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92(2001)-03-0101-07

丝绸之路,是指从事丝绸贸易的古代交通路线,现已探明有3条:海上丝绸之路、陆地丝绸之路和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受造船和航海技术的限制,使用较晚,不早于公元前2世纪^①。陆地丝绸之路是人们熟悉的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南北道、通向中亚的道路,始于公元前2世纪张骞通西域和汉武帝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4郡。欧亚草原丝绸之路,指东起蒙古高原、西至黑海沿岸的一条交通线。由于在张骞通西域前的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在南亚、西亚(古波斯)和东北亚(今阿尔泰)发现了我国造的丝织品,因之这些丝织品是主要通过欧亚草原丝绸之路进行贸易的观点成为学术界的共识^②。关于这条道路的西段走向,希罗多德的《历史》一书有较详细的记载^③,但它的东段走向目前还没有确指。本文拟以宁夏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时代最为明确的属青铜时代的鹿、虎岩画资料,探讨它们与草原丝绸之路的关系,并论述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有悖之处,敬请指正。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我国丝织品在境外的发现

收稿日期 2001-02-26

作者简介 朱存世(1966-),甘肃庄浪人,宁夏银川市文物管理处,馆员。

李芳(1969-),女,宁夏中卫人,宁夏银川市文物管理处,助理馆员。

万方数据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织丝的国家。现已发现最早的丝织品是新石器时代钱山漾遗址出土的残绢片,经鉴定为家蚕丝织物^④,距今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到了商代,丝织技术有了发展,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出绮、纱、罗文组织的高级织物,如河北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铜觚上,黏附有绉纱的痕迹^⑤,故宫博物院藏的商代玉戈、铜戈上,也有绮的痕迹^⑥等。进入周代,丝织技术更高,工艺更先进,能够织出锦、纱、罗、纨、绮等高级织物,如湖北江陵马山战国墓出土的各种精美的丝织品,说明此时已有了复杂的提花装置和熟练的技术^⑦。上述出土实物资料证明我国不仅有 5000 多年的家蚕丝织史,而且到了青铜时代,已能够制作出工艺先进、丰富多彩的精美丝织品,这为丝绸贸易提供了物质条件。

在境外的考古遗物和文献资料中,屡有我国丝织品的发现和记载。巴泽雷克墓群,位于阿尔泰山北麓前苏联戈尔诺阿尔泰省乌拉干区乌拉干河畔,是公元前 5 世纪的一处贵族墓地,经 1929 年、1947 ~ 1949 年的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 12 座。由于西伯利亚寒冷的气候环境,因而墓中的许多丝织品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中有我国产的丝织品,数量、种类均较多,“有用大量的捻股细丝线织成的普通平纹织物。这类织物有小块的,有整幅的(覆盖在皮衣服的上面)”^⑧。三号墓出土有用红、绿两种纬线斜纹显花的织锦;五号墓出土的一块华丽的丝绸上,用彩色织线绣着开满花朵的树枝,神鸟凤凰飞舞其间^⑨。阿尔泰山北麓巴泽雷克墓群出土的我国产丝织品,充分证明至迟在公元前 5 世纪我国产的丝织品已在阿尔泰山一带流传,同时也证明丝绸贸易的开始时间至迟在公元前 5 世纪。

另外,在西方的古典著作中,也有关于我国丝织品的记载。最早记载丝织品的是希腊诗人阿里托芬的《吕西斯特刺忒》(公元前 411 年),其中提到一种被称做“Amorgis”的绢织物做成的长上衣叫“Amorgiam”^⑩。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 ~ 公元前 322 年)的著作中认为最先用绢织物的是科斯岛人布拉特斯之女帕姆扑莱^⑪,此应指公元前 4 世纪的丝织品;历史之父“希罗多德(公元前 5 世纪)以及塞诺芬(公元前 430 ~ 公元前 354 年)等多次提到帕提亚人(古波斯人)穿着“medic dress”(米底亚式衣服),这种衣服华丽、奢侈、昂贵,普罗科阿底斯(公元 500 ~ 565 年)对此解释说:“这种东西是指古希腊惯于用来做叫做 Medic 长上衣的绢,如今它们叫做 seric(赛里斯)”^⑫。我国许多学者认为这些见于西方古著作中的丝织品属我国产的丝织品,非本地的发明^⑬。因此,公元前 3 世纪前希腊文化圈人物雕像上所表现出的丝织品,理所当然地属我国产的丝织品,如巴底隆的《命运女神》(公元前 438 ~ 公元前 431 年)、埃列克底邕的《柱像》及其他公元前 5 世纪希腊雕刻品中见到的优雅衣褶所表现的绢织品^⑭。公元前 6 ~ 公元前 5 世纪希腊雕刻作品《阿夫罗狄蒂的诞生》中所表现出的轻薄的丝织服饰^⑮。日本学者铃木治对上述希腊雕刻品研究后认为,希腊丝织品的使用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6 ~ 公元前 5 世纪。

上述考古出土物和文献对我国丝织品的发现和记载,说明至迟在公元前 6 ~ 公元前 5 世纪我国产的丝织品经阿尔泰山地区传入罗马文化圈。由于人们熟知的陆地“丝调之路”始于公元前 2 世纪,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到达西域的路线,迟于我国产的丝织品在罗马文化圈的流传三四百年,那么,我国青铜时代产的丝绸是如何经阿尔泰山传到罗马文化圈的呢?

青铜时代丝织品在我国北方地区的发现

我国青铜时代考古资料证明,至迟在春秋战国之际,丝织品已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流传,并有两个丝织品资料出土相对集中的地区:一是新疆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地区,一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1980 年,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天山山脉中部的阿拉沟 30 号古墓中发现了菱纹链式罗,经考证和鉴定属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中原地区的丝织品^⑯;1963 年,在新疆北部、阿尔泰山南麓的阿勒泰克尔木齐古墓群第 22 号墓中,出土了战国时代的素面铜镜^⑰。此证明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的地区与中原地区存在着丝绸贸易和文化交流。1973 年,在内蒙古杭锦

旗桃红巴拉匈奴墓中,出土了形制与中原地区相似的青铜器和铁器,其中部分铜器和铁器上黏附有丝织品的残件^⑮,此墓出土物经¹⁴C测定,时代为665年±150BC;1906年,内蒙古土默特旗水洞沟门一座战国时期的匈奴墓中,出土了一批铜器,铜器的“铜锈上均附有丝织品的痕迹”^⑯。而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其他地区的考古中,迄今未见有青铜时代丝织品的出土记载。由于鄂尔多斯地区的地理位置便于和中原地区青铜时代经济、文化的交流,丝织品在蒙古高原的南缘——鄂尔多斯地区出现是合乎情理的。既然传统意义上为人们熟知的陆地丝路始于公元前2世纪,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发现的丝织品非此路传播,那么,无意中将人们探寻的目光集中到新疆阿尔泰至内蒙古鄂尔多斯之间的广阔地区,探寻两地之间丝绸传播的具体路线。在青铜时代,欧亚大草原的青铜文化存在着交流和相互影响,这已为出土的此时代的动物纹饰及铜牌所证明^⑰。但受考古资料的制约和文献记载的缺如,具体到丝绸传播的路线,则没有明确的特指。这样,青铜时代北方草原地区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一直成为困扰史学界的难题。所幸近二十年来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岩画调查和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青铜时代的岩画资料架起新疆阿尔泰地区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之间的联系桥梁,并将两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它们是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发现的鹿岩画和虎岩画。

二

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位于我国北方系岩画的中部、新疆阿尔泰和内蒙古鄂尔多斯之间,是我国北方系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贺兰山和北山青铜时代岩画中,有两类时代明确、已被学术界肯定并且重要的动物岩画——鹿、虎岩画。鹿岩画风格新颖、造型独特、制作精细,与习见的鹿岩画有别,在我国北方系岩画中找到它的原型,但与蒙古国、外贝加尔湖地区流行的鹿石上鹿的风格、造型相同,姑且命之为“鹿石鹿”岩画。虎岩画是我国北方习见的岩画题材,主要分布于宁夏的贺兰山、北山和内蒙古阴山岩画中。对鹿石鹿岩画和虎岩画分布地域、风格的探讨,是了解两地关系和探寻草原丝路东段走向的关键。

鹿石鹿岩画

在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发现的鹿石鹿岩画自北向南有:平罗县归德沟岩画点一幅^⑱,大西峰沟岩画点一幅(有叠压关系,晚期的动物岩画叠压在鹿石鹿岩画上)^⑲,苏峪口岩画点一幅^⑳,贺兰县贺兰口岩画点一幅^㉑,青铜峡市芦沟湖岩画点一幅^㉒,中卫北山大麦地岩画点和大通沟岩画点各一幅^㉓,中卫西北腾格里沙漠岩画点一幅^㉔。这些鹿岩画的共同特点是:背部呈驼峰状突起,喙状嘴巴大张前伸,脖颈部过分伸长前倾,圆睛。依造型分为A、B两组,A组有归德沟、苏峪口、腾格里沙漠鹿石鹿岩画,除前述的共同特点外,还有大角弯曲后仰,角尖几近臀部,额部有二绺前突起,有的腿细,有的腿和后半身呈砍断状,均用减地阴纹敲凿法制作;其余各岩画点的鹿石鹿岩画为B组,其特点是没有大而后仰的角,有的额部没有两绺前突起,以凿刻阴纹勾勒法制作为主,个别的用减地阴刻法制作。两组岩画的主要特征相同,说明它们属于对其蕴涵的某种宗教信仰熟知的民族,而其个性,可能反映了有一定的时段间隔,非一个时段制作,二者技法的变化也说明了这一点,证明这种形态的鹿,在贺兰山和北山经历了较长时间。

上述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造型奇特的鹿石鹿岩画(开始有人称“鸭嘴兽”),其实是蒙古、外贝加尔、阿尔泰等地流传的鹿石上刻制的鹿。所谓鹿石,是指分布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外贝加尔地区、图瓦和我国新疆阿勒泰的一种著名遗存,是在一些斫平的四面体、圆形的石柱或石板上凿有各种动物图形、古代武士图像和其它动物图形。其中动物图形以鹿为主,形态特别,因之称为“鹿石”,此即“东方鹿石”(相对于黑海沿岸以主要刻制武士像等为特征的西方鹿石而言),其流传时间约与斯基泰时代相关^㉕,约相当于我国的青铜时代。蒙古、外贝加尔和图瓦等地鹿石上鹿的特点是:喙状头

部前伸,嘴巴大张,两只枝状角仰向背部 额部相应的有两处前突起 颈部和躯干前半部过长,前后腿相距甚近,一般都细而小得不成比例 有时仅有上半截,像被砍断一般,有时当腿全部画出时,则呈弯曲状,前腿高于后腿,二者连接不严,中间留有空隙'^②。这种特点的鹿和贺兰山与北山岩画中名为鹿石鹿岩画的特点完全一致,说明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这种特点的鹿与蒙古、外贝加尔等地区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另外,这种造型的鹿在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地也作为一种岩画的题材。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西北 160 公里处的塔姆加雷岩画中,有一幅上、下排列的 3 只鹿岩画,鹿的形态为背部呈驼峰突起,颈部特别长且前伸,各有两只枝状角后仰,腿呈蹲踞式^③ 澳什市西北 40 公里的雷骑套山苏拉特—塔什岩画,也有与蒙古鹿石上的鹿形态相同的鹿岩画^④。这说明蒙古等地鹿石上的鹿作为一种风格,也在岩画中出现。

更重要的是,在阿尔泰山南麓的我国新疆富蕴、青河两县发现鹿石。富蕴县有吐尔洪鹿石,青河县有头海鹿石和三海子鹿石,均分布于高山夏季牧场的牧道或主牧区。鹿的造型一致,均为喙状头部前伸,嘴巴大张,背部呈驼峰突起,大角仰向背部,腿有的呈蹲踞式、较细,有的短呈砍断状^⑤。这些鹿石上鹿的形态与蒙古、外贝加尔等地区鹿石上鹿的形态的一致性,说明新疆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在青铜时代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 这些新发现的鹿石与该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中原丝织品相联系,也说明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可能是青铜时代草原丝路的中转站和枢纽。这样,鹿石和鹿石鹿岩画,将蒙古、外贝加尔等地区及我国新疆北部阿尔泰山以南地区与贺兰山、北山和腾格里沙漠联系在一起。但这一线即从腾格里沙漠至阿尔泰山以南地区,存在着鹿石鹿岩画的空缺,那么,此二地之间靠什么联系呢?

虎岩画

虎岩画是我国北方系岩画中比较常见且重要的题材,主要发现于河套以西的内蒙古阴山、桌子山岩画点及宁夏贺兰山、北山和腾格里沙漠岩画点。据统计河套以西的狼山、桌子山有 14 幅^⑥,贺兰山和北山岩画点计 29 幅^⑦,腾格里沙漠岩画点发现一幅^⑧。这些虎岩画,有的单体,有的群体,有的扑食,有的被猎人猎杀。而猎虎岩画,似乎反映着某种仪式,是某种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北山、贺兰山至阴山是以虎为某种宗教象征民族的游牧地,同时表明上述地区形成一个以虎为某种宗教信仰的文化圈。这些地区虎岩画的主要特点为虎张口,牙齿突出,利爪,长尾下垂,身躯饰以曲折形人字纹,有的直立,有的曲足呈蹲伏状,用敲凿阴线条勾勒法制作,均是写实性。以虎为饰的青铜器,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出土较多,如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南山根遗址出土的对虎纹装饰剑柄的青铜短剑,双虎对卧,张口露齿,身躯饰以曲折形人字纹,臀部饰以圆圈纹^⑨;河南上村岭虢国墓地 M1612 出土的铜镜,镜纹饰双虎扑鹿,后有 大雁飞翔,其中虎利爪、张口露齿、长尾下垂,蹲伏状,腿部饰以圆圈纹,身躯饰以曲折纹^⑩。宁城南山根双虎纹青铜短剑的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⑪,上村岭虢国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⑫。河北栾平县筒子沟 M76、M78 出土的蹲踞形虎饰牌,时代为春秋时期^⑬,鄂尔多斯地区乌盟凉城县出土的虎咬马饰牌^⑭、宁夏固原地区彭阳县出土的虎衔羊纹饰牌^⑮,为战国时期。上述春秋、战国时期的虎纹短剑、铜镜及牌饰等与虎岩画造型的一致性,尤其上村岭虢国墓 M1612 出土铜镜背面的虎纹与贺兰山大西峰沟虎岩画形态的相同性,说明虎岩画的时代至迟在春秋时期已流传,在战国时代进入繁荣阶段。同时,这些虎岩画的题材在中原地区的出现,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北方草原地区和中原地区有经济文化交流。贺兰山、北山直至阴山流传的青铜时代的虎岩画,在腾格里大沙漠发现一幅,为猎双虎岩画,其形态、构图与大西峰沟虎岩画相似。在腾格里沙漠以西地区,这种造型的虎岩画在河西走廊西端嘉峪关的黑山岩画点发现两幅^⑯,在新疆天山山脉中段的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岩画点发现一幅,同时,此岩画点发现了不见于本地却在阴山岩画中常见的对马题材^⑰。这样,贺兰山、北山常见的虎岩画在腾格里沙漠、河西走廊西段的嘉峪关、天山山脉中部呼图壁的发现,将贺兰山、北山与天山山脉联系在

一起,弥补了鹿石鹿岩画在两地关系中的缺环,使两地成为一条富有生命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交通线路。

鹿石鹿岩画和虎岩画反映的历史文化信息

贺兰山、北山及腾格里沙漠发现的鹿石鹿岩画,其风格、造型与蒙古、外贝加尔地区、图瓦和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鹿石上的鹿一致,证明贺兰山、北山及腾格里沙漠的鹿石鹿岩画与上述地区的鹿石相关。问题是,上述鹿石鹿岩画是受鹿石影响所致呢,还是鹿石上的鹿在上述地区的再现?这些鹿石鹿岩画在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是否还有发现?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岩画调查资料表明,鹿石鹿岩画是阿尔泰、蒙古等地鹿石的再现,其作者,是对这种形态的鹿有某种崇高宗教感情的民族,即活动于阿尔泰、蒙古、外贝加尔等地的民族。

首先,鹿石鹿岩画发现于贺兰山、北山和腾格里沙漠,仅有8幅,数量不及当地岩画的四分之一,说明这种风格对宁夏岩画没有影响。鹿石鹿岩画制作精细,形态、风格与阿尔泰、外贝加尔等地区鹿石上的鹿一致,表明这种岩画鹿应是对其制作技术熟知、对其蕴含的宗教内容有崇高感情的民族所为,因此,其作者应是上述地区鹿石文化圈的作者。

其次,岩画调查资料表明,鹿石鹿岩画除阴山发现一幅受其影响的岩画外,主要分布在宁夏北部的贺兰山、北山及腾格里沙漠。近二十年来,我国北方草原地带的岩画调查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出版的报告集有《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盖山林著,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贺兰山岩画》(许成、卫忠著,文化出版社,1993年)、《贺兰山与北山岩画》(李祥石、朱存世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阴山岩画》(盖山林著,文物出版社,1984年)、《桌子山岩画》(梁振华著,文物出版社,1998年)、《乌兰察布岩画》(盖山林著,文物出版社,1986年)及一些调查简报,这些岩画资料的分布地域基本包括了鄂尔多斯以西至河西走廊西端以东的广阔地区。检索这些岩画资料,巴丹吉林沙漠周围包括龙首山和岩画资料丰富的曼德拉山,未发现鹿石鹿岩画。阴山山脉北部的乌兰察布大草原,亦未发现鹿石鹿岩画,此排除了鹿石鹿岩画的作者越北山、经巴丹吉林沙漠北缘进入贺兰山的路线,亦排除了它的作者从蒙古国历乌兰察布草原、越阴山进入河套地区的路线,那么,惟一的路线是越天山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经武威进入腾格里沙漠南缘,然后进入北山、贺兰山。如果说鹿石鹿岩画还不足以证明这条线路存在的话,那么,虎岩画资料同样仅分布于这条线路,绝非一种巧合。

虎岩画主要分布于贺兰山、北山及阴山。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嘉峪关黑山发现两幅,在天山山脉中段的呼图壁发现一幅。检索已发表的《新疆岩画》(苏北海著,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丝绸之路岩画艺术》(周菁葆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及上述已出版的岩画报告,在岩画分布广阔的新疆,迄今仅天山山脉中部发现一例这种风格的岩画。在巴丹吉林沙漠周缘和乌兰察布草原岩画中,未发现这种风格的虎岩画。这种现象意味着虎岩画的分布与鹿石鹿岩画在地域上有一致性。阴山、贺兰山和北山主要分布的虎岩画在黑山、天山的发现与阿勒泰、蒙古、外贝加尔地区鹿石上的鹿在腾格里沙漠、北山和贺兰山的发现,将河套地区、鄂尔多斯地区与阿尔泰地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意味着这条岩画分布区是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同时,天山、黑山虎岩画的作者如鹿岩画的作者一样,可能是虎岩画文化圈的民族从事丝绸贸易在异域对虎进行某种宗教活动的反映。

三

通过对虎岩画和鹿石鹿岩画分布地域的探讨,反映出青铜时代贺兰山和北山不仅与阿尔泰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是鄂尔多斯地区至阿尔泰地区丝绸贸易的桥梁,是鄂尔多斯地区丝绸运往阿尔泰地区、经阿尔泰至境外的必经之地。两类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岩画分布地域的重叠性,昭示出青铜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东段走向,其经过的区域大致为:从中原运至鄂尔多斯地区的丝绸,经阴山山脉西段——狼山南下进入贺兰山,循贺兰山东麓西向进入北山,经北山西向进入腾格里沙

漠,沿腾格里沙漠南缘越武威进入河西走廊,历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直到阿尔泰地区。这条线路表明草原丝绸之路亦利用了河西走廊,同时表明河西走廊至鄂尔多斯路线,主要沿草地与山脉交会的山麓而行。至此,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没有从贺兰山西麓西经腾格里、巴丹吉林沙漠草原直达阿尔泰地区而是绕道河西走廊越天山进入阿尔泰地区?为什么不从河西走廊东南越陇山或历渭河平原与中原直接相连而是经腾格里沙漠、北山、贺兰山与鄂尔多斯相连?为此还得探讨当时河西走廊民族的分布和河西走廊东南部民族的分布。

河西走廊是月氏的主要分布地

月氏,是活跃于我国西部的一个大族。其最初游牧地,据《汉书》记载,游牧于“敦煌祁连间”。祁连山,依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在“甘州西南”即今张掖西南的某一段,不包括现在所说的整个祁连山脉。这样,敦煌至张掖间河西走廊的西部应是月氏的居住地。另据《史记》记载,匈奴“右贤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此处的上郡指北地郡以东。北地郡是秦直接控制的最西的郡之一,匈奴右贤王的牙帐设在上郡以北,那么他管辖地区的西界应在上郡以西,达到北地郡西北的流沙(今腾格里沙漠)。匈奴“西接月氏”,就是匈奴与月氏相接于流沙,这样,河西走廊的东头也是月氏的居地^⑤。唐魏王泰的《括地志》认为“凉、甘、肃、瓜、沙等州,本月氏国。”另有观点亦认为“敦煌、祁连间为乌孙、月氏共居之地,而河西走廊的东头——武威地区,主要是月氏人的游牧地区。”^⑥由此看来,河西走廊是月氏的居住地,月氏在青铜时代于河西走廊的分布,对理解草原丝绸之路经武威地区进入河西走廊有指导意义。因为,月氏族是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的商业运往,建立起中西交流的桥梁。《管子·揆度篇》记载,中国自古以来,“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禺氏”即“月氏”,禺与月一音之转,属同一个民族^⑦。说明月氏人将玉运至中原,将中原的丝绸运到西方,成为中原地区与阿尔泰地区贸易的中介。另外,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的《穆天子传》在叙述河套附近的地区时提到“禺氏之平”,即月氏居住的平野,这应是从事丝绸贸易的月氏人在河套地区的一个居住地。这则记载是月氏商人从事丝绸贸易经贺兰山到达河套地区的又一证据。当然,从鹿石鹿和虎岩画的分布可知,伴随月氏商人从事丝绸贸易的还有阿尔泰地区直到外贝加尔地区鹿石文化圈的游牧民以及虎岩画文化圈的游牧民。

河西走廊东头在青铜时代为秦的势力范围

戎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的西北民族,兴起于殷周至春秋时期,分布于泾、渭河流域及瓜州。至秦穆公(公元前659~公元前621年)时,“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⑧这样,原来西戎的居住地归入秦的势力范围。至秦王朝,其控制的最西境亦在这一范围,如陇西郡(今黄河以东的甘肃东南部)和北地郡(今黄河以东甘肃的东北部)以及宁夏东南部,大抵是西戎各部的住地。问题是,秦的兴起和丝绸之路有什么关系呢?史料有迹象表明,秦的兴起阻断了青铜时代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直抵中原的路线。据《史记》记载,公元前3世纪初齐人苏厉给赵惠文王的一封信中提出,假如秦国出兵截断山西北部恒山一带的交通线,则昆仑山的玉石无法运到赵国^⑨。这封提示性的信件透露着秦阻断了中西丝绸贸易的历史信息,否则何惧秦截断恒山一带的交通线呢?可能因此之故,秦之名流传于西方,以致西方人最早知道的中国就以“秦”为代表。

至此,我们知道由于善于经商的月氏人久居河西走廊和秦的势力范围对河西走廊直到中原地区交通的阻断,使阿尔泰地区到中原的丝绸贸易路线经河西走廊东头的武威进入腾格里沙漠,越腾格里沙漠进入北山、贺兰山,到达鄂尔多斯地区,再从鄂尔多斯地区到达中原地区。对这条丝绸之路的探得,使我们得知贺兰山和北山是青铜时代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同时,河西走廊早在青铜时代已是中西丝绸大道。

注释:

- ①⑩⑪⑫⑬⑭⑮戴禾、张英莉《先汉时期的欧亚草原丝路》，载张志尧主编的《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出版社，1994年。
- ②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该书收录马雍、王炳华、戴禾、张英莉、苏北海及日本学者长泽和俊的文章均有此识。
- ③希罗多德在《历史》卷四中说：公元前5世纪黑海周围是斯基泰人的游牧范围，希腊商人经斯基泰人与东方有贸易关系，先后经过撒乌罗马泰伊人、布边诺伊人、拉散该诺伊人、玉尔卡伊人、阿尔吉派伊人的住地，最远到达伊塞多涅斯(羌族)的地区。见《历史》卷四第20节第439页，王嘉雋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
- ④周匡明《钱山漾残绢出土的启示》，《文物》1980年第1期。
- ⑤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等《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纺织品》，《文物》1979年第6期。
- ⑥陈娟娟《两件有丝织品花纹印痕的商代文物》，《文物》1979年第12期。
- ⑦陈跃钧《江陵马山一号墓出土的战国丝织品》，《文物》1982年第10期。
- ⑧⑨〔前苏联〕鲁金科《论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
- ⑩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沟竖穴木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新疆简史》第1册第14页。
- ⑪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克尔桥古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1期。
- ⑫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年第1期。
- ⑬《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第四编《战国时期》。
- ⑭乌恩《我国北方古代动物纹饰》，《考古学报》1981年第1期。
- ⑮许成、卫忠《贺兰山岩画》第50页图248、249，文物出版社，1993年。
- ⑯⑰⑱⑲⑳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第62页第33组，第101页第3组，第74页第35组，第122页第6组，第115页第33组、第142页第1组，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 ㉑㉒笔者于2000年8月调查腾格里沙漠岩画时，发现了一幅与归德沟和苏峪口形态相同的鹿岩画。见《腾格里沙漠岩画》一文，待刊。
- ㉓㉔㉕㉖〔前苏联〕H. JI. 奇列诺娃《关于蒙古和西伯利亚的鹿石》一文及该文图二 9.10，图一 3，图一 3，载《文物考古参考资料》，内蒙古文物工作队1979年编印。
- ㉗苏北海《新疆岩画》第44页图22、23，第45页图24、25，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 ㉘盖山林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4年。
- ㉙李祥石、朱存世《贺兰山与北山岩画》，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
- ㉚㉛刘国祥《夏家店上层文化青铜器研究》图四 7，《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 ㉜㉝宋新潮《中国早期铜镜及相关问题》图三，《考古学报》1997年第2期。
- ㉞郑绍宗《中国北方青铜短剑的分期及形制》，《文物》1984年第2期。
- ㉟郑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青铜器纹饰艺术集》第27页图6，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 ㊱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图二 1-5，《考古》1990年第5期。
- ㊲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嘉峪关黑山古代岩画》图七 1，载《丝绸之路岩画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 ㊳王炳华《新疆呼图壁县康家石门子生殖崇拜岩雕刻画》图二，载《丝绸之路岩画艺术》，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
- ㊴㊵杨建新《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第103~104页、第103~10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 ㊶何秋涛《王会篇笺释》卷下。
- ㊷㊸《史记》，卷五《秦本纪》、《赵世家》十三。

(责任编辑 孙颖慧)